

我的童年

张太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一束芬芳的马兰花

——序《童年》

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 韩望愈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，几乎每个童年都有独特的内涵和品味。人们对于童年的珍惜总带着自己身世经历的酸甜苦辣，总带着时代生活的风雨雷电。年逾七旬的张太把他的童年认真地写了出来，而且还真地回到故乡拿起放羊铲同牧羊娃娃们又漫了一次“花儿”，做了一次顽童，果真是盛世的一件奇事、喜事，值得庆贺，可堪赞美。

从张太的自叙中可以知道，他是一个酷爱文学又专门受过高等语言文学教育的人。虽然大学毕业分配做了教师，后来又做了行政工作，但文学的火种从未在他的胸中消失，而且写作的欲望愈老愈炽。这生动地说明，文学之于人生，文学之于社会，文学对于那些热爱生活和自觉肩负历史重任的人，是何等重要而如空气水般须臾不可分离！张太的写作技巧和文字功力可能还算不上十分老辣，但张太对于文学的执着之情和平实的劳作态度，以及那扎实朴素处处流露真情的文学，与那些言之无物的高论，与那些连公文都写不通，连批文件都满篇

错别字，还高喊自己要当什么“家”的文化官员相比，是何等的高洁而令人尊敬！

张太把他的童年写出来是不容易的。这是他数十年希望的实现，数十年心血的结晶。人到了老年，往往多的是回忆与谈论，鲜有秉笔辛勤耕耘、长久写作的。而张太不，虽然青年时期没有进入文学圈，没有进入作家行列，而老了，退休了，他也不把时光消磨在闲适安逸之中，日思夜谋，冬夏不息，硬是写成了这本二、三十万字的《童年》。处女作问世，圆了作家梦，也为社会创造了一笔财富。

我与张太以前并不相识，但读了他的作品很觉有几分亲近。我与我的许多朋友、同学、同事倏忽间已是老之将至，大家互道心曲，各述己好。有说闲适者好，有说游历者好，有说养颐者好，有说有些事但不要太忙者好，有说反正不要闲下来……想来，世界万姿千态，人的品性千差万别，各有各的过法，各有各的生活方式，知己者为好，无所谓优劣。但象张太这种在有限的生命空间里，仍锲而不舍地去实现自己青少年时的追求，未尝不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，未尝不是一种幸福。张太老而好学，老而有成，老而又多了一些人生况味。所以张太的作品是超出了它的内容本身的，张太的《童年》的出版是可喜可贺的。

祝福您，赞美您，张太！

1998年元月20日晨

于长安怡园

引 子

儿童的梦是非常甜蜜的，也是极其美好的。

在我的童年时代，有一位诲人不倦、倍受尊敬的老师曾经讲述过许许多多关于西安的神话般的传奇故经。从此我在自己幼小的心灵里，偷偷地编织着五彩缤纷的梦，憧憬着幸福美好的未来。

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敬爱的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下，我多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。解放后劳动人民彻底翻身当了国家主人，我在西安参加了革命工作，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在山区工作的我童年时代的老同学都特别羡慕，在农村种地的我的幼儿时代的伙伴们更是求之不得。但自己心中却有一个始终解不开的疙瘩。

西安古称西京，是中国古文化艺术的发祥地，先后有 12 个封建王朝建都。我在这个物华天宝，风景秀丽，震撼世界的中国历史名城渡过了 30 多个春秋，典雅而古老的长安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我虽然长期工作、生活在这个国内外游客梦寐以求的旅游胜地，心里却总在眷恋着那生我养我的穷山沟。特别到了晚年，这种恋念故土的感情更为深沉，夜梦总是在我家的土窑院里萦迴，常常梦见已故的亲人和同龄人，他们还是过

着我童年时代的那种苦难日月。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穷。外地人都说我的家乡太穷太苦，十分荒凉。而我自己却对她念念不忘，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爱。我归心似箭，马上要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故乡，去探望久别的亲人，去拜访儿时的朋友，去寻找已经丢失的东西，去回味人生最甜蜜的生活。

我手提旅行包，急急忙忙登上一列开往兰州的特别快车。火车在飞奔前进，我心潮澎湃，思绪万千，已经进入对往事的回忆。

“同志，请吃贵妃柿子。这种水果举世闻名，在香港市场是抢手货，比兰州的糖软儿（梨的珍品）更宝贵。”火车刚刚驶过马嵬坡——杨贵妃墓在铁道以北，我对面坐着一位年近60岁的旅客，对我微笑着似乎要说什么。他大脸盘，高鼻梁，大胡子。满面红光，已经谢顶的标准教授头梳得有条不紊。他穿着一套笔挺的藏青色全毛西服，结着大红领带，举止潇洒，谈吐风生，向我热情打招呼，同时送来两个又红又软的火晶柿子。

我很高兴地说：“谢谢您！”我对他点头致意，同时进行观察。这位旅客的音容笑貌非常熟悉，似乎在那里见过。忽然，我对他的大胡子产生了浓厚兴趣，在自己脑海中闪出“王大胡”三个字。便一跃而起，抓住他的双手笑道：“听口音，您象兰州砂锅客（对兰州人的贬义词）。如果我不健忘，那您应该是西北师院（现为西北师大）生物系王大胡同学。我还清楚地记得，我们在大学初次见面时，您送我两个糖软儿，捋着大胡子赞道：‘兰州的糖软儿举世闻名，比王母蟠桃还好吃！’怎么现在兰州的糖软儿又贬值啦？”

他象老学究研究古生物那样，装模作样地对我端详良久。然后睁大两只小眼睛，以排山倒海之势，朝我胸前猛击一掌，

打开了话匣子：“莫非您真的是西北师院中文系张老夫子？您额头上这块大伤疤现在更是光彩夺目。您在学校是‘口头文学家’，我的‘王大胡’绰号是您起的。有人在深山投石问路，我在火车上投柿访友。今天在秦国见到老同学，这真是作梦也难想到。您上大学时穿一件长袍，文质斌斌，迈着八字步，象个落难秀才。现在却西装革履，大腹翩翩，俨然是政府官员派头。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待，您现在飞黄腾达，衣锦还乡了！”

我戳了他一拳说：“老兄刚见面，就来挖苦我呀！”他叫王国泰，家住兰州市。那时学校闹学潮，他能冲锋陷阵。他噘着大胡子继续说：“您还记得吗？解放前夕，兰州大中学校闹学潮，咱们肩并肩进行反内战、反压迫地正义斗争，烧毁外国传教士的小卧车，捣毁国民党省党部，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甘肃省政府发行 300 万银元建设公债（实际是国民党政府官员准备逃跑的应变费）游行示威运动。那时我们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决心推翻吃人的旧社会，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”

我很激动地说：“那时咱们都是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，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不共戴天之仇。那次兰州大中中学生进行游行示威斗争，取得辉煌胜利，以后甘肃省政府没有发行 300 万银元的建设公债。1949 年春，西北大军阀马步芳上台，首先要从西北师院学生头上开刀。他恶狠狠地说：‘我要把这些杂娃的头挂在翠英门上！’当时学校采取紧急措施，赶快停课放假，把学生疏散到外地，他的阴谋未能得逞。否则，你我都是马匪刀下的冤鬼！”

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坐在一起格外亲热，互相问寒问暖，各自介绍情况。然而彼此谈得最多的，还是我家乡人民的苦难生活。

他点燃了一支香烟，戴上大墨眼镜，滔滔不绝地说：“真是无巧不成书啊！我过去在你县温泉乡太平村搞过社教，蹲过点，又进行过扶贫调查，还在您家吃过饭。许多人告诉我，您在儿童时代遭了很大苦难。你的家乡实在太穷困，庄稼人活得太孽障……”

我很认真地说：“有巧能成书呀！我的家乡一贫如洗，可是有千奇百怪的民间故事，写成小说可以和《天方夜谈》相媲美。这个穷山沟写小说的题材，俯拾即是。旱灾能写一本书，雹灾能写一本书，地震能写一本书，匪患能写一本书，豺狼能写一本书。可是穷乡僻壤无人问津，它是一个被作家遗弃的角落。您在省政府工作多年，手头占有大量资料，何不为落后山区著书，替穷苦农民说话？”

他顺水推舟地说：“您的家乡民间故经丰富多彩，口头文学兴旺发达，山歌花儿耐人寻味。。我确实掌握不少创作素材，很想写一点东西。可是茶壶里煮饺子，肚里有倒不出来。要写研究生物的论文，自己会当仁不让。要我写小说，比鸭子上架还难。您是学文学的，底子厚，基础好，当地情况了如指掌，这个任务应当由你去完成。”

我诉苦说：“自己学的专业课早已抛到九霄云外，长期在政府机关起草公文。要创作，是老虎吃天，无处下爪。”

他责怪道：“您是麻雀落到胡子上——牵须（谦虚）。先听我说说群众创作的十大怪：窑洞土坯垒，睡觉没铺盖，上炕要盘腿，吃饭舔碗得学会，屋里有一个水烟袋，大姑娘无穿戴，娶媳妇用钱买，洋芋蛋当好菜，封建迷信把人害，穷人都有一把辛酸泪。”

我怒气冲冲地说：“老同学不关心民间疾苦，怎能糟踏穷

山沟的庄稼汉？外地人给陕西冷娃编了一个‘十大怪’，什么‘房子一边盖，面条象裤带，锅盔象锅盖，大姑娘不对外，凳子不坐蹲起来’等等。当地土著听了这些话都很反感。您是本地人，为啥还要讲这样难听的怪话？”

他摇头晃脑地说：“非也！非也！这完全是一种误会，我慢慢地向你道来。这些话乍听起来特别刺耳，但它的主题词是反映当地贫穷落后的不良现象，譬如：‘睡觉没铺盖’，‘大姑娘无穿戴’，‘洋芋蛋当好菜’，‘吃饭舔碗得学会’这说明穷山沟老百姓穷困到了极点，对粮食何等珍惜。尤其是‘窑洞土坯垒’这种怪现象，外地人无法理解。本来应该在平地用砖瓦木石去兴建平房或高楼，可是当地农民穷得一无所有，只有用自己的双手托些土坯，箍个土窑洞去安家。”

他沉思片刻，又补充说：“有人给青海编了三句顺口溜——青海有三宝：山上不长草，说话‘阿么了’，风吹汽车倒。青海土著听了这些话，也是火冒三丈。其实这些话是反语，虽然有些夸张，但是很好地反映了当地乡土民情和气候恶劣的不良现象，语言幽默、尖刻，是善意的讽刺。”

我恭维道：“闻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还有何教诲？愿洗耳恭听。”

他神采奕奕地说：“您家乡的方言比广东话更富有个性，我试说几句，请多指教。通渭人把‘我们’叫‘曹’，把‘去年’叫‘年时’，把‘那个时候’叫‘喔咋’，把啥地方叫‘阿达’，把‘挣扎’叫‘跌拌’，把逃走叫‘颠山’”。

我点头赞道：“您说得完全对，可以打100分。可是这个穷山沟除了方言土语，再没有啥好东西。”

我对面有一个看书的学生插话道：“这些方言土语很好

听，可以写厚厚一本书。”

另一个油头粉面的广东人反驳说：“你们北方人说，广东话比鸟语难懂，刚讲的这些方言土语才是真正的鸟语，有啥用处？”

在场的老百姓群起而攻之，有一个身体魁梧的大后生握紧拳头，咋咋呼呼地骂道：“你这个南蛮子还想欺负西北人？”广州人最怕打架，缩作一团，赶快赔情道歉：“我说错了话，实在不好意思(思)！”

王大胡以北方的古文化自傲，不把南蛮子放在眼里。他摆摆手，对广州阔商投去蔑视的目光。又转变话题说：“你县温泉比临潼温泉水质好，水温高，硫磺味特别浓，浴后皮肤润滑，感觉全身轻松舒服。它能治疗腰腿疼和各种皮肤病，是一个神泉，也是一个聚宝盆。长期以来，外地客人纷纷去温泉沐浴治病，现在，全国的皮肤病患者都到那里去治疗疾病。在那里开辟一个旅游点，对当地群众会有很大好处。”

我兴致勃勃地说：“发展旅游事业能挣大钱，对地方有许多好外。在80年代，美国总统里根专程参观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临潼兵马俑，一次设宴耗资一万美金。最近日本天皇慕名前来观光西安，下榻在西安的阿房宫宾馆，随行众多，浩浩荡荡，其豪华享受比美国总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

他气得吹胡子瞪眼睛，大声叫道：“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！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，尽情去挥霍享受，一桌筵席所花费的资金，你们太平村几百户农民一年用不完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，这个世界太不公平！”

有一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教训说：“你们这些老干部过去对中国革命有很大贡献，现在却变成时代落伍分子。当今的社

会，大家都讲吃讲穿。有钱不去享受，挣钱又有何用？”

我严声厉色地批评道：“现在有些年轻人好了伤疤忘了痛，一饱不知千日愁！我们的国家并不富裕，老百姓正在奔小康。大家要无私奉献，不能开口闭口去讲享受。坚持勤俭建国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，才能国富民强。”

老同学拧着眉头，向我提出一个新问题：“您在省上工作多年，经常去各省区开会、考察，究竟啥地方的群众生活最苦？”

我脱口而出：“全国 30 个省区都有我的足迹。走遍天涯海角，我的故乡最苦。”

他又问道：“有人说，渔民生活最苦，您可曾去过渔村？”

我笑着说：“您讲的是老皇历啊！过去渔民没有土地，住的茅草屋，驾着一叶扁舟，整天在惊涛骇浪中去奔波，生活相当辛苦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渔民发了大财，茅草屋变成高楼大厦，破船换成汽艇。我曾经走访过烟台、大连、青岛、珠海、海口、厦门等地的渔村，有许多渔民变成大富翁，兴建大洋房、小别墅，比大城市头面人物还阔气，国家高干和大学教授望尘莫及。”

他最后叹息道：“唉！您说得很对。我走过许多山区和渔村。还是您家乡的农民生活最苦。解放后，全国农村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可是这个穷山沟多灾多难。1959 年，当地发生过一次特大天灾人祸，饿死不少人。党中央、国务院对你县的灾情非常重视，及时调运大批粮食和衣物进行抢救，使无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民重见天日。当时公安部谢富治部长、王昭副部长先后两次去你县视察灾情，研究解决有关问题。”

我插话说：“1959 年，我家乡发生饿死人的问题，现在真相大白，县志都有详细记载。那年暑假我回家探亲，在县城西

川路上碰见一个白土咀人，年龄不到40岁，面黄肌瘦，拄着棍子行走。我问道：“老哥啊，你害啥病？”他很惜惶地说：“啥病也没有，是饿成这个样子。”我回到家中，看见大人娃娃都脸势不好，向妈妈询问情况。她很忧愁地说：“上半年好多年轻人都饿得走不动，宋家庄接运去送公粮，见有人在路上跌倒断了气。今年夏收很不好，冬天咋过呀？”村里的老人和年轻人都叫苦说：“不得了啦！今年冬季又要遭民国18年的大灾荒，不知要饿死多少人。”我刚返回学校，行政党小组召开党员座谈会，要求回家同志反映农村问题。我如实谈了家乡存在的问题。同时还说：“我想向毛主席反映情况”。

老同学睁大眼睛问道：“那你肯定要招祸！你说是不是？”

我点头说：“你的判断很正确，在党内批判我几个月。不久咸阳市传达庐山会议精神，党员科级以上干部参加。以后学校批判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，上挂下联，我变成活靶子。有人在党员大会批判我说：‘彭德怀诬蔑甘肃18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，你说自己的家乡饿死了人，你比彭德怀更恶毒！’大家给我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的大帽子，自己心中不服，要求组织派人去当地调查情况。”

老同学吁了一口气说：“如果能派实事求是的人去调查，你会没有问题。”

我很气愤地说：“我的专案组何兵，是一个好说假话、削尖脑袋向上爬的小人。他颠倒是非，唯恐天下不乱。他在批判我的大会上恶狠狠地说：‘党组织已经派人调查过了，你家的那个生产大队是全国的模范队，办了15个工厂！你说当地饿死人，完全是造谣！’他讲的有鼻子有眼睛，似乎确有其事。我怒发冲冠，进行揭穿。向他质问道：‘你说有哪15个工厂？能讲

出3个工厂的名字也好。’他张嘴结舌，哑口无言。”

王大胡笑着骂道：“你这个笨驴还敢踢人！是不是又惹了麻烦？”

我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他们找不到我的罪恶活动，最后要挖思想根源。不管大家在会上怎样进行分析，我总是沉默寡言。校党委韩副书记比较正派，会上很少发言。他对我说：‘你为啥不说话？’有人要给我戴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帽子，我不能接受。就对他很恭敬地说：‘韩书记啊，我政治水平低，挖不出思想根源，请你帮我挖挖。’他拍拍脑袋说：‘我看你是富裕中农思想。’一言九鼎，我得到了解脱。然而我对‘富裕中农思想’的帽子还不想戴，进一步问道：“我是中农成份，咋能产生富裕中农思想？”他解释说：‘你妈有富裕中农思想，你替你妈说话，代表了她的富裕中心思想。’”

老同学追问道：“学校最后对你怎样处分？”

我叹口气说：“下放到咸阳市周陵公社赵家大队，进行劳动改造。1961年，咸阳市委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，传达党中央文件精神：凡是因甘肃问题受过处分的干部一律进行甄别。咸阳机校领导对我说：‘过去对你批判错了，现在进行平反，官复原职。’我感到学校有些领导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，重用政治骗子为非作歹，使好人受害。我压在心中的一块石头已经落地，对他要求说：‘我啥长都不要，让我尽快离开学校。’

王大胡很高兴地说：“党中央对你的问题进行了平反，对你家乡的问题进行妥善处理，明辨了是非。当时周总理亲自派检查团，对你县的问题进行秘密调查，弄清了事实真相后，逮捕法办了以县委书记席道隆为首的犯罪分子，使无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民跳出了火坑。”

我点头说：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我家乡的群众生活有很大改善。可因地理条件太差，还有不少人家没有解决温饱问题，人民政府正在进行扶贫工作。”

老同学很神秘地对我说：“我以后多次去你村工作，听到一种奇闻，不知你听说过没有？”

我随便答道：“在这个穷山沟，啥怪事情都会发生。”

他摆摆手说：“大家传说，你家有几百两银子，埋在老庄高房底下，1959年叫贼娃子偷走了。当时有人梦见：你家高房底下飞出许多白鸡娃。你听说过这话没有？”

我很伤心地说：“这个传说本村大人娃娃都大讲特讲，我早听说过。父亲临终时对我交待：‘咱家高房地底下的窖里埋一黑瓷坛银子，有600多两。这些银子是太太和爷爷留传下来的传家宝，你一定要保管好，在最困难的时候再用它。’1948年春，家庭生活十分困难，我准备考大学，没有一点经济来源。为了帮助爸爸解决困难，渡过难关，我给奶奶讲了埋银子的地方。过了四五天，这一坛银子不翼而飞。”

老同学插话说：“大财主不一定有这么多银子，你丢了几代人的巨大财富，一定会在家中闹得天翻地复。你说对不对？”

我很忧虑地说：“塞翁得马，焉知非福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祸。农村过去有不少父子，兄弟为了争夺家产，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。我认为钱财是人身上的垢痂，取了一层又有一层，千万不能为了它去伤亲人之间的和气。我推断，这笔银子是奶奶和爸爸转移了地方。如果我把这事张扬出去，土匪会在深夜来吊烤他们，最后闹得人财两空。因此我守口如瓶，从未向任何人提说此事。”

他笑道：“那你愿意把这一大笔银子拱手让给别人吗？”

我皱着眉头说：“如果您自己想吞这 600 多两银子，不去告诉奶奶，绝对不会发生问题。我的心太善良，对问题考虑不周，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。这笔遗产奶奶、妈妈等人都应该享受，我们兄弟姊妹也可以享受。我最害怕得了银子的亲人不去用它，将它长期埋在地下会造成恶果。”

他问道：“这些银子真的再没有出土吗？”

我叹道：“唉！自己耽心的问题不久发生了。1959 年秋，正是咸阳机校批判斗争我的时候，家乡发生了罕见的大饥荒。外祖母逃到定西她侄儿家，靠做针线活糊口。妈妈跑到永登我二弟处，逃了一条活命。奶奶、爸爸、新妈和几个妹妹都先后饿死，家里没有人掩埋尸体。听别人讲，爸爸的大女儿最后用镰头去挖高房地下的那银子。她只挖了一尺多深，人就断了气。村里的歹人连夜挖开地窖，盗走了银子。”

他又问道：“你能知道这个盗银贼是谁吗？”

我很气愤地说：“庄里人都指名道姓地讲，我家的银子是我们的一个亲房长辈盗走的。他是一个披着人皮的豺狼，我小时候还把他当好人看待。”

对面有一个青年哈哈大笑道：“大家看看，老爷有那么多银子，自己舍不得用，结果当了饿死鬼，真是太可怜！”

老同学站起身说：“天水车站已到，护送张老夫子下车！”

汽笛一声长鸣，列车徐徐开动。我恋恋不舍地向老同学挥手致敬，进行高呼：“祝君一路顺风，望您返老还童！”

他在窗口大声叫道：“盼您睡在家乡的热炕头上做一个童年时代的美梦！您一定要为穷山沟写一本书啊！”

我拼命呐喊：“让我试试看呀！”

天水到我家，有 200 华里山路。我从北道埠搭上汽车，在

崎岖不平的公路上进行颠簸。在那大雪纷飞的冬天，有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拉我去牛谷河滑冰。大家开始跪在冰上打毛弹，又站起来进行摔跤，最后去担“黄尻子”，真是热闹极啦！有一个捣蛋鬼将一块冰按到我脸上，冰得特别厉害，我忽然从梦中惊醒。原来自己不知啥时候在摇摇晃晃的车箱里进入梦乡，将脸贴在冰凉的车窗玻璃上。

汽车开到县城，我步行到本村，正是小学生回家的时候。他们都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们。这些学生很有礼貌，谁看见我，都嘴很甜地叫一声“爷爷”，向我问长问短。我感慨万端，向这些可爱的儿童背诵了一首古诗《回乡偶书》：

少小离家老大回，
乡音无改鬓毛衰。
儿童相见不相识，
笑问客从何处来。

有一个高个子学生拍着手说：“爷爷背诵的这首古诗我念过，你肯定是回家探亲来的！爷爷你说我猜得对不对？”

我热泪夺眶而出，使劲吐出一个字：“对！”

我在家里吃过晌午饭，拿上打狗棍，先看望本村长辈，又拜访自己童年时代的伙伴们。每家住一个小院，占地面积比省军级干部的住宅还大，我感到非常羡慕。各家养的咬狼狗都很恶，见了生人猛扑过来乱咬。主人拍着它的头骂道：“你真是一个混眼子狗，连自己人都不认识！”那狗很听话，向我摇头摆尾，表示问好。我走进土窑洞，主人先让脱鞋上炕。我在炕上盘腿大坐，真象山西五台山的老和尚。乡亲们见到我，十分高兴。老人都叫我的奶名，自己感到特别亲切。山里人待人很热情，对我进行盛情款待。大人先送来水烟袋，又生火炉去熬紫

阳茶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碎娃端来洋芋、熟面、拌汤，拉着我的手叫吃饭。我咬一口洋芋，舔一口熟面，用酸菜拌汤冲进肚里，感到比吃山珍海味还香。碎娃又端来麻子让我去噓，要和我进行比赛。麻子只有书的句号那么大，又黑又小，外地人都不会噓它。我小时候噓麻子最快，大人娃娃都十分佩服。老当益壮，我要和碎娃进行比赛。我将麻子放到嘴里噓了半天，没有吐出一个成形的麻仁。我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：“一代更比一代强！”婆娘娃娃都笑出了眼泪。邻里乡党见了我，都喜欢打听大地方的新鲜事情。然而大家谈论得最起劲的还是我们在幼儿时代干的荒唐事情。有一个同龄人揭我的老底说：“你最爱偷吃别人的水果，穿着开裆裤去上树，把‘牛牛’都磨烂了。”在场的人们都笑破了肚子。如果是厅长或省长这样戏弄我，自己会大发雷霆。然而同龄人的一句戏语，能引起我对儿时美好生活的回忆，感到无比亲切。我转变话题说：“大家需要我帮啥忙，自己情愿分文不取打短工。”有人很诚恳地说：“你是一个大学问家，为我们穷山沟写一本书。”我点头道：“让我学手去献丑。”

已经是农历四月，关中农民早换了单衫，可这山区的人们还穿着脏兮兮的破棉衣。靠吃糠咽菜渡春荒的村民，三三两两上山去挖野菜。我找了一个铁铲铲，提了一个菜篮篮，和一群碎娃去上山。我在山上挑着苦曲菜，怀念着早已去世的亲人，感到非常心酸。我想起妈妈挖苦曲菜时给我编的那首山歌，很想放开喉咙大吼一声。可是妈妈已经去世多年，自己心里特别难过，无法去唱这首山歌。

许多牧童约我上山，我拄着长鞭杆欣然前往。山中空气新鲜，能够益寿延年。和牧童生活在一起，自己心中充满喜悦。那些放羊娃、放牛娃有长幼之分，无贵贱之别。有些远方碎爷爷

比大孙子年龄小，长辈做了不光彩的事情，晚辈鼓着眼珠子笑道：“爷爷孙子老兄弟，把你拉来用屁薰！”那大孙子说到做到，顺手把碎爷爷压到尻子底下，“嘣！嘣！嘣！”一连打三个响屁，我笑得前仰后翻。我和他们在一起，自己感到已经返老还童。互相说笑打闹，我又变成孩子王。我们站在高山顶，扯开嗓子打山歌、唱乱弹、漫花儿，生活得多么滋润。山野是牧童的乐园，也是自己的乐土。